

關於

「玉壺春瓶」

謝明良



以往對於造型呈侈口、細弧頸、溜肩以下置圓鼓腹所謂玉壺春瓶的功能、名稱或器形來源，並存著幾種不同的見解。擇要言之，大致上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一、器形是由漢代的鍾演變而來的。二、其祖型可上溯北朝的鑲金細頸銅瓶。三、是宋代的創新瓶式。四、可能是花器。五、可能是酒器。

其中，主張是花器者的依據是一九八〇年代江西宋墓壁畫中見有一對玉壺春瓶置於供桌上，內插折枝牡丹（陳定榮：一九九二）。至於酒器論者則是援引

《水滸傳》（三十八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的記載，從而認為：「玉壺春瓶之名始自宋之美酒『玉壺春』明矣」（劉靜，九九八）。

其實，蘇東坡已經說過唐人多以春稱酒。晚唐李肇《國史補》注所列舉的天下名酒有「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以及「烏程之若下」。參酌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可知，若下名酒也稱若下春。其次，晚唐長沙窯執壺亦見「奇絕好美春」、「進餘美春酒」等釉下褐彩題記

（長沙窯編輯委員會，二〇〇四）。所以說，以春名酒，或在春後再加酒字，是唐代人們慣用的稱謂方式。按照這樣的理解，玉壺春即玉壺酒或玉壺春酒，所謂的玉壺春瓶應該就是裝盛玉壺春酒的容器。

玉壺春酒於唐代以迄清代文人的詩詞中屢見不鮮。問題是，我們根本無從得知各個時代用來裝盛玉壺春酒的瓶式，是否即今日所謂的玉壺春瓶？也因此儘管比《水滸傳》的年代更早唐代著名詩人岑參（七一五—七七〇）〈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聞道輞



圖一 玉壺春瓶 乾隆時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已明確提及玉壺春酒，我們仍舊不宜穿鑿附會地與今日所謂玉壺春瓶相提並論。同樣的道理，元馮子振與釋明本倡和詩《梅花百詠》：「插花貯水養天真，瀟灑風標席上珍，清曉呼童換新汲，只愁凍合玉壺春」，是少數的以玉壺春瓶插梅之例，但其瓶式如何？雖已無從

得知，但應留意的是就如最近揚之水所指出，馮氏原唱云「旋汲澄泉滿膽瓶」，明本則和詩稱「只愁凍合玉壺春」，可知玉壺春和膽瓶是可以互換的同類（揚之水，二〇〇七）。至於前述玉壺春瓶為花器論者所引江西宋墓壁畫用例，因原發掘報告書未揭載圖版，詳情不明。不過，就目前的圖像資料看來，以玉

壺春式瓶插花之例，至少可上溯北魏時期，詳情將於後文敘及。

「玉壺春瓶」的造型和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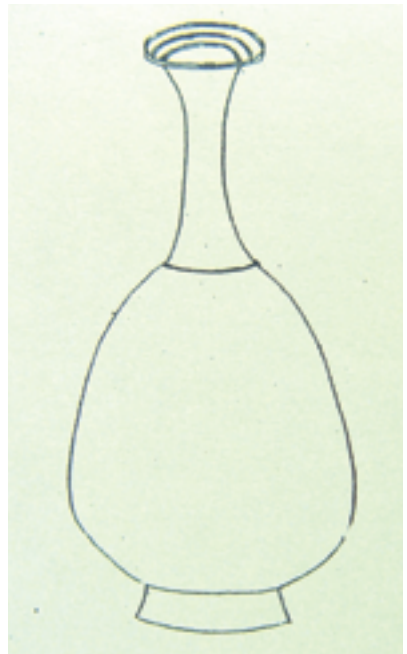
清末寂園叟著《陶雅》說：「狀似美人肩而頸短、腹大、口頗侈者，曰玉壺春」；民國初年許之衡著《飲流齋說瓷》也說：「玉壺春，口頗侈，項短，腹大，足稍肥，亦雅製也。天青、積紅者尤居多數，此式大半官窯，甚少客貨，而官窯又大半純色釉也」。從清末民初針對於玉壺春瓶的器形描述看來，確實和今日所理解的玉壺春瓶之造型特徵一致。然而，就目前的資料看來，將此一瓶式稱呼為玉壺春瓶似乎是入清以來的事例。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編纂的《萬壽盛典初集》已記載有名為「萬壽玉壺春」的明代宣德官窯和一件「宋凍青玉壺春」；雍正、乾隆造辦處檔案更不乏「青花白地玉壺春」等官窯製品的記事。雖然，可與



圖四 同右「金壺瓶」銘文拓本



圖三 《定陵》出土「金壺瓶」



圖二 《西清古鑑》所見「漢素瓶」

文獻史料相對照的傳世實例較為少見，但從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磁胎洋彩玲瓏玉壺春式套瓶」（圖一）原附清宮木匣所刻品名（廖寶秀，二〇〇六），可知此一器形和今日所謂玉壺春瓶大體一致的瓶式，於清宮中也是被稱為「玉壺春式套瓶」。另外，乾隆四年（一七三九）由內大臣海望所呈覽的銅器當中，因受到乾隆皇帝青睞而留用的一件「青綠三箍玉壺春」，從文字所表現的裝飾特徵而言，不排除其有可能即被收錄於《西清古鑑》的瓶口內側裝飾三道弦紋（三箍？）的所謂「漢素瓶」（圖二）。無論如何，就留存有圖像資料並可與文獻記載相對照的現存實例而言，將於圓腹或洋梨形身腹上置細弧頸的瓶式稱呼為玉壺春瓶，目前似乎只能上溯清代初期。

另一方面，北京昌平縣明神宗萬曆皇帝（一五七二—一六二〇）定陵第六器物箱內亦見有一對造型呈喇叭式口、細長頸，鼓腹下置圈足的金質玉壺春式瓶，瓶另附寶珠鈕平頂圓蓋，蓋鈕並飾金鏈與瓶頸部位加裝的圓片穿孔相接，作工頗為講究（圖三）。應予留意的是其底部刻銘為：「大明萬曆庚申年銀作局製金壺瓶一把蓋攀索全重三十兩」（圖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一九九〇）。毫無疑問，由銀作局製造於神宗駕崩年（一六二〇）的三十兩重帶蓋之清代人所謂玉壺春瓶，於明代晚期則是稱為「壺瓶」。其實，「壺瓶」一名也見於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登丙戌科進士朱琰所著《陶說》，如卷六《說器》就提及明代「壺瓶」或「五彩水藻金魚壺瓶」。有趣的是，尾崎洵盛在為《陶說》做註解時，認為「壺瓶」，也寫作「胡瓶」，乃同音轉訛，即日本俗稱的「盛盞瓶」（尾崎洵盛，一九八〇）。眾所周知，「盛盞瓶」也稱「洗盞瓶」或「仙盞瓶」，其造型正是於玉壺春瓶一側置把，對側設流，其中又以明代嘉、萬年間加飾色彩的所謂金欄手仙盞瓶最為藏家所珍重（圖五）。雖然我無法確認尾崎視「壺瓶」為「盛盞



圖六 山西廣勝寺水神廟元代壁畫線圖



圖五 嘉靖窯金欄手「仙壺瓶」

瓶」的依據是否來自日本代代相傳收貯文物箱盒上的「箱書」？但就結果而言，做為「盛蓋瓶」主體的瓶身造型的確符合定陵「金壺瓶」的外觀特徵。明代後期「壺瓶」似乎頗為流行，如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書》就記載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景德鎮官窯燒造有「看瓶、牡丹瓶、壺瓶七百八十」件。

玉壺春瓶的消費情況

如果依據傳世遺物、考古發掘出土品或壁畫等圖像資料來觀察玉壺春瓶的存在情況，雖亦有助於理解此一瓶式和其他器物之間的共伴關係，卻難以掌握其相對具體的使用脈絡及其在各個場域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基於定陵自銘「金壺瓶」的確認，使得我們有理由依恃歷代文獻有關「壺瓶」之記事，進而結合考古發掘資料，勉力復原所謂玉壺春瓶的使用脈絡及其消費情況。

早在一九九〇年代何翠媚已經利用山西廣勝寺水神廟元

代壁畫所見玉壺春瓶等資料（圖六八）（中國美術全集編集委員會，一九八八），指出玉壺春瓶為酒器（Chunmei Ho, 1996），不過，我們從龍門石窟蓮花洞第四十一號龕南壁中央龕內「菩薩思惟像與供養使者」浮彫場景所見瓶花（龍門石窟保管所等一九八七，另拓本見楊之水二〇〇七，圖七），可知玉壺春瓶之瓶式至少可上溯北魏晚期，並且直到唐代昭陵貞觀十七年（六四三）長樂公主墓壁畫均是做為花器來使用（陝西歷史博物館等，一九九一，圖八）。另一方面，如果結合考古發掘出土的墓葬壁畫所見玉壺春瓶和畫面上其他器物略做觀察，則不難發現一般稱為「備酒圖」的壁畫畫面所見器物，其實有其固定的展出格式。比如說，前引廣勝寺水神廟壁畫或山西文水北峪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馮文海），一九六一）、陝西西安韓森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二〇〇四）等元墓壁畫所見玉壺春瓶，都是和梅瓶、帶杓酒海、帶托盃等盛酒、飲酒具共同出現在同一畫面，顯然是當時成套的酒具之一。其次，陝西浦城元



圖八 昭陵長樂公主墓壁畫（643年）摹本



圖七 龍門石窟蓮花洞「菩薩思惟像與供養使者」浮雕 北魏晚期

代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墓壁畫之玉壺春瓶，則又是和帶托盞及匜共伴出現在桌面上（圖九、十）（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劉恒武），二〇〇〇）。顯而易見的，相對於宋遼

墓葬壁畫描繪墓主飲宴的「開芳宴」，是以梅瓶、帶溫碗的注壺、帶托盞等做為酒宴的組合道具（圖十一）（宿白，一九五七），元代講究的飲宴場景，雖亦見梅瓶，但玉壺春瓶似乎更受歡迎，以至於浦城元墓壁畫或《事林廣記》所見備酒場景，只見玉壺春瓶和帶托子的盃盞。特別是浦城元墓壁畫並無梅瓶，但出現玉壺春和匜的組合，反映出一種成組的時尚飲酒道具的誕生。明初洪武年間曹昭《格古要論》說：「古人用湯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折盃、茶鍾、壺盤，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國始於元朝，沽（古）定官窯俱無此器」，先不論其對於個別器物出現年代考證容或有誤，此一評論幾乎可說是對上述考古資料所見器物消長情況的總結。我認為曹昭所謂的「胡瓶」應即「壺瓶」，也就是「玉壺春瓶」，而「有嘴折盃」可能即帶流的「匜」。無論如何，入元以來，玉壺春瓶和匜已是被廣泛使用或者說為

世俗飲酒時必備之道具組合，也因此出土有銀玉壺春瓶的江蘇延佑七年（一三二〇）錢裕墓亦伴出有銀匜（無錫市博物館（錢宗奎，一九六四）。另外，不僅著名的四川遂寧窖藏伴出有銅玉壺春瓶和銅匜（遂寧市博物館等（莊文彬，一九九四），安徽合肥窖藏亦見銀玉壺春瓶和銀匜（吳興漢，一九五七），後者從伴出的刻銘得知，其相對年代約在元代元統癸酉（一三三三年）之後不久。但應說明的是，梅瓶並未因玉壺春瓶的大量出現而銷聲匿跡。事實上，從河北保定、江西高安等出土有元代至正型青花的窖藏資料看來，梅瓶是和玉壺春瓶、匜共伴出現的。至於器身紋飾和同時代繪畫相近母題的元代景德鎮青花玉壺春瓶等作品是否有施靜菲所指出般，其除了具有盛裝功能，還兼具展演的裝飾價值？（施靜菲，二〇〇〇）還有待觀察。

歷代文獻有關「壺瓶」的記事委實不少，其時代早自唐代，晚迄明清，所涉及的壺瓶



圖十 陝西浦城元代墓葬壁畫（1269年）



圖九 陝西浦城元代墓葬壁畫（126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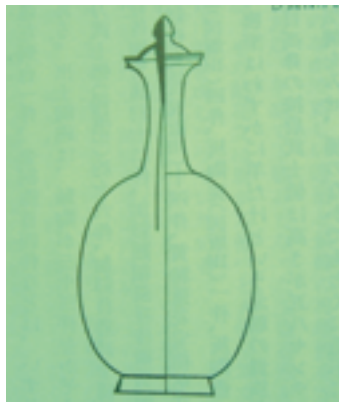
圖十一 白沙宋墓壁畫

質材計有金、銀、錫、鐵、水晶、琉璃和陶製品。其用於各種的場域，包括：葬儀（如《元史》（卷七十七）載元代帝王「殉以金壺瓶二」）、賞賜（《朝野僉載》載唐太宗以「金壺瓶酒」賜任環妻）、賀禮（如《明會典》（卷六十六）回門儀注禮）、遊戲（如宋·耐得翁《都城紀勝》一卷，以「壺瓶」為投壺）、或收藏（如《南宋館閣錄》卷三，古銅壺瓶）等。其次，儘管明末高濂《遵生八牋》曾經建議時人使用於古代原是注酒用的「壺瓶」來插花（卷十四），甚至以「瓦壺瓶」做為養生調理處方的沖泡容器

（卷十一），然而壺瓶最主要也最常見的用途無疑是注酒的容器，而此一酒器性質也可說明「壺瓶」為何會經常出現在葬儀、賞賜、賀禮、飲宴等多種場域。另外，壺瓶的質材也涉及禮制或市場價值。比如說，《明史》載洪武二年勅葬開平王常遇春的明器壺瓶是「錫造金裹之」；相對於元代帝王以「金壺瓶」入壙殉葬，《元史》則明令庶人酒器可使用「銀壺瓶」（卷七十八）。

玉壺春瓶的原型和祖型

設若以定陵出土的自銘「金壺瓶」的器式為基點，順序向上追溯中國玉壺春瓶的早期樣式，於方法上應屬可行。近年謝玉珍在其學位論文中已經依據定陵壺瓶自銘器指出，明初王侯墓的玉壺春瓶即「壺瓶」，並援引孫機之論考，將壺瓶式追溯至北齊庫狄迴洛墓等出土的細頸銅瓶（謝玉珍，二〇〇五）。但我認為，孫機該一見解未必可靠（孫機，一九九六）。至少在我



圖十二 山西北齊庫狄迴洛墓（562年）出土銅瓶

圖十三 河北北魏高氏墓（524年）銅瓶



圖十五 河南北齊范粹墓（575年）出土白釉綠彩瓶



圖十四 河北北魏封魔奴墓（521年）銅瓶

看來，孫機將之視為宋元時期玉壺春瓶之原型的北齊庫狄迴洛墓（圖十二）、臨潼慶山寺唐代地宮等出土的細頸銅瓶，其和玉壺春瓶是分別屬於不同的器式系統，因此其間並不存在繼承、演變的關係。

就我個人的理解，大體具有細長頸、圓腹造型的南北朝時期的銅質或陶瓷瓶，其實可

區分成幾個瓶式，各個瓶式各有其祖型和獨自的演變、發展脈絡。如果先不論一部份不易明確歸類的中間型作品，則似乎可以將南北朝時期的細長頸瓶的瓶身區分為卵形（A式）、柿形（B式）、蘋果形（C式）和洋梨形（D式）。其中，屬於A式的卵形瓶見於河北曲陽北魏正光五年（五二四）高氏墓

銅瓶（圖十三）（河北省博物館等《鄭紹宗·一九七三》或湖南長沙爛泥沖南朝墓（M3）青瓷瓶（湖南省博物館《高至善·一九五九》），山西北齊大寧二年（五六二）庫狄迴洛夫婦合葬墓（王克林·一九七九、河北北齊天統二年（五六六）崔昂墓（河北省博物館等《唐雲明等·一九七三》），以及晚迄八世紀前半的陝西臨潼慶山寺地宮所見銅瓶亦屬同一型式（臨潼縣博物館《趙康民·一九八五》。於柿形腹下置喇叭式高圈足的B式長頸瓶最早見於江西清江宋元嘉二十七年（四五〇）墓的青瓷瓶（傅冬根·一九八三），而河北景縣北魏正光二年（五二一）封魔奴墓（圖十四）（張季·一九五七）、湖北當陽長坂坡等南北朝期墓銅瓶（宜昌地區考古隊《全錦雲等·一九八三》，以及湖北鄖縣唐嗣聖元年（六八四）李徽墓的三彩瓶可能亦屬同一系統（湖北省博物館等《全錦雲·一九八七》。雖然B式和C式有時不易明確地區分，但C式蘋果形腹的作品可以著名的河南北齊武平六年（五七五）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綠彩瓶為例（圖十五）（河南省博物館·一九七三），後來的山西唐代文明元



圖十七 河南安陽隋張盛墓（595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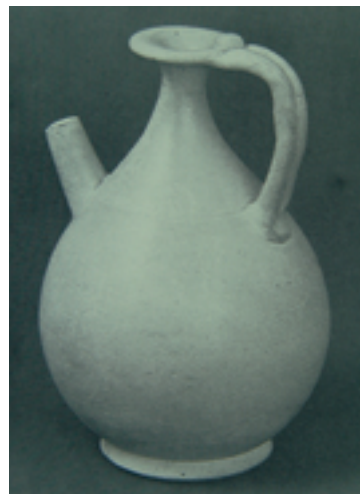


圖十六 河北北齊封子繪墓（562年）出土醬釉瓶

年（六八四）樂道仁墓陶瓶（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晉東南文物工作組《沈振中等·一九六五》）或前引臨潼慶山寺加彩陶瓶可能都是繼承了此一型式。至於做爲本文主要論旨的D式洋梨形瓶的早期實例，目前見於前引龍門石窟蓮花洞北魏晚期佛傳故事圖（同圖七）以及河



圖十九 長沙窯注壺 中國私人藏 9世紀



圖十八 唐代注壺 日本私人藏 7-8世紀

北景縣北齊清河四年（五六二）封子繪墓的醬釉瓶（圖十六）（張季·一九五七），河南安陽隋開皇十五年（五九五）張盛墓（圖十七）（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一九五九）、河北曲陽隋大業三年（六〇七）尉任弘墓（國家文物局主編·一九九三）亦屬同一型式。應予一提的是，D

式洋梨形瓶到了唐代出現一些變形，如於同式瓶身一側加置注流，另一側設把的唐代白瓷注壺即爲一例（圖十八）（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一九八六）。類似的帶把注壺還見於九世紀湖南長沙窯製品，後者更於瓶身飾瓜棱（即所謂瓜棱形帶把注壺）（圖十九）（長沙窯編輯委員會·二〇〇四），但仍可輕易識別出其原型是來自D式洋梨形瓶，文獻所載「壺瓶」，即今日習稱的玉壺春瓶即是繼承了此一器式。

如果以上的器式分類基本無誤，那麼孫機將北齊庫狄迴洛墓（同圖十二）或臨潼慶山寺塔地宮出土的A式瓶，做爲原型理應來自北朝D式瓶的宋元時期玉壺春瓶之前身，顯然並不恰當。從考古出土資料可知，A、B、C、D四式瓶曾經並存於同一時代，河北邢窯隋代窯址亦曾出土A、B、D等三式標本，甚至燒造於洋梨形器身但頸上另置盂形口的作品（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一九八七；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處編著·二〇〇六》，後者於陝西西安隋大業四年（六〇八）



圖二二 波斯薩珊王朝鍍金銀壺 6-7世紀 大英博物館藏



圖二十 山西大同北魏墓（M112）石棺床拓本（局部）



圖二一 山西北齊庫狄迴洛墓（562年）出土鉛黃釉貼花壺

李靜訓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一九八〇）或河南鞏義市北窯灣唐墓（M一三）等隋唐墓葬出土陶瓷

亦可見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趙清等，一九九六》，其原型甚至可上溯山西大同北魏墓（M一一二））石彫

棺床的瓶花圖（圖二十）（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二〇〇六）就此而言，呈洋梨形身腹的D式瓶之瓶口造型還可區分為盤口、盂形口以及略呈喇叭形的外翻敞口等三式，前述河北北齊封子繪墓（同圖十六）、隋代張盛墓（同圖十七）出土品屬盤口式，李靜訓墓則呈盂形口，長沙窯瓜稜式壺則屬外翻的敞口（同圖十九）。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盂形口瓶目前多見於隋唐時期作品，盤口和敞口兩式作品則是宋代以來玉壺春瓶並存的兩種器式，如洛陽道北元墓（M1056）即共伴出土了上述兩式玉壺春瓶（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桑永夫等，一九九九》）。

有關宋元時期以來玉壺春瓶的造型或裝飾變遷擬留待稍後再予介紹，在此應予留意的是，初見於北朝後期的玉壺春瓶外觀雖予人洗鍊、明快的作風，但北朝以前似乎又無可做為其前身的類似瓶式，這不免會讓人懷疑所謂的玉壺春瓶是否可能屬外來的器式？就此而言，我們很容易會想起前述出

土有A式卵形帶蓋鑲金銅瓶的北齊庫狄迴洛墓，因其同時出土了器形類似D式洋梨形的鉛黃釉貼花壺（圖二一）（王克林，一九七九）。從後者壺身滿飾模印貼花裝飾之特徵看來，其可能和金屬工藝品有較大的關連，如大英博物館藏傳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出土的波斯薩珊王朝鍍金銀壺（六一七世紀）即見類似作風（圖二二）（東京國立博物館，二〇〇三）。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五六九）李賢夫婦墓出土的薩

珊朝鑲金執壺之壺身亦與D式洋梨形瓶有類似之處（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韓兆民，一九八五）。至於伴隨出土有唐咸通十五年（八七四）監送真使「衣物帳」的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敘利亞製玉壺春瓶（圖二三）（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編，一九九四；M. Alam & D. K. Harburg-Salter, 1999），則是此類瓶式輸入中國的具體實例。

一旦提及中國進口外國玻璃及其對中國工藝品的影響，



圖二三 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敘利亞玻璃瓶 8-9世紀

不免讓人想起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十世紀的白瓷玉壺春瓶（圖二四）（佐藤雅彥等，一九八〇），因為其頸肩部位所見數道凸稜裝飾，其實又和二至三世紀敘利亞等地玉壺春式玻璃瓶瓶頸之凸稜頗有類似之處（圖二五）（Donald B. Harden, 1992）。無獨有偶，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著名的越窯青瓷八稜瓶之頸肩部位亦見數道凸弦紋（圖二六）（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編，一九九四），其祖型應該也是來自外國的玻璃器，如日本私人藏的一件年代約在九—十一世紀之間的伊斯蘭玻璃瓶（圖二七），即暗示了此一可能性。上述諸例表明，北朝至唐代的工藝品對於外來金屬器或玻璃器的借鑑和模倣，所以我認為所謂的玉壺春瓶也應該在此一脈絡中予以掌握。

雖然我必須承認，本文無法確鑿地指出做為中國玉壺春瓶祖型之外國工藝品具體的時代、產地或質材，遑論其由西向東的傳播路徑。但是我們卻也不宜低估隨著亞歷山大大帝東征（西元前三三四—三二三



圖二七 伊斯蘭玻璃瓶 日本私人藏 9-11世紀



圖二六 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越窯青瓷八棱瓶 9世紀



圖二五 玻璃瓶 2-3世紀



圖二四 白瓷瓶 10世紀 大英博物館藏

年)而正式萌動的所謂希臘化時代可能給予中國工藝美術品的影響。或許會招致作文有如天馬行空之譏評，我仍想指出，做為古希臘至希臘化時期著名金工市鎮的今義大利Taranto市區已經製作出精美的金箔飾銀質玉壺春瓶(圖二八)(日本UNESCO協會連盟，一九八七)。不僅如此，隨著紀元前五世紀中期之後Attic陶器的衰退，興起於義大利南部的Apulian紅像式陶器亦經常出現玉壺春式瓶。例如Taranto四號墓出土陶器即為一例(圖一九)(日本UNESCO協會連盟，一九八七)。應予留意的是Taranto墓葬有不少是既出玉壺春式瓶，同時伴出稱為Dinochone的帶把酒壺(圖二〇)(日本UNESCO協會連盟，一九八七)，而這種呈尖嘴三瓣式的注壺也是隋唐時期常見的器式，陝西富平縣上元二年(六七五)李鳳夫婦墓即出土有類似造型的白瓷把壺(圖二一)(富平縣文化館等，一九七七)。如前所述，今日俗稱玉壺春瓶之瓶式於明代以前文獻稱為「壺瓶」，而有關「壺瓶」的最早且最著名的記事則

是《貞觀政要》(卷二)等所記載的太宗賜李大亮「金壺瓶」的軼事。不過，同一記事於《新唐書·李大亮傳》(卷九九)則做太宗賜亮「胡瓶」。宋鄭瑗《井觀瑣言》評論這兩種稱謂的緣由時說：「今人呼酌酒器為壺瓶，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史炤通鑑釋文以為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壺字正當作胡耳」。此外，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二)所載唐太宗令上官齋「金壺瓶」於宋《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二)也是作「胡瓶」。看來「壺瓶」確實即「胡瓶」。從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跡》玄宗多次賞賜安祿山「金鞞花大銀胡餅」、「金窰細胡瓶」等用例看來，唐代「胡瓶」經常是指由外國輸入中國的進口瓶式(深井晉司，一九六八)。唐太宗顯然對於呈細頸、洋梨形腹造型即今日所謂玉壺春瓶之來路了然於心，才會逕稱它為「胡瓶」。



圖三十 義大利Taranto出土注壺



圖二九 義大利Taranto出土紅像式陶瓶



圖二八 義大利Taranto出土金箔飾銀瓶

小結

今日俗稱的「玉壺春瓶」於清代以前文獻稱作「壺瓶」。「壺瓶」雖說廣泛使用於許多不同的場域，但其主要的功能則是花器和酒器。做為盛酒容器的「壺瓶」可以裝盛各種酒類，但絕不限於玉壺春酒。同樣的，《水滸傳》所提到的江州上色玉壺春酒也可以裝盛在形制各異的酒器中，其當然也包含元代以來飲宴場合流行的「壺瓶」。「壺瓶」和玉壺春酒的關係，僅止於此。或許是由



圖三一 陝西富平李鳳夫婦墓（675年）出土白瓷注壺

於玉壺春酒自唐代以來即備受文人青睞，甚至漸成吟詩作賦時美酒的風雅代稱，以致於入清以後，頗有將盛酒的「壺瓶」之器式逕呼為「玉壺春瓶」而沿用至今。

玉壺春瓶之瓶式並非中國的創意，然而其做為宋代以來一種時尚的酒器而廣為人們所使用，甚至成了東亞其他國家模倣的對象。如日本愛知縣猿投窯址出土的十世紀白瓷帶把注壺之原型（圖二二）（檜崎彰一編，一九七九），可追溯至於玉壺春瓶加



圖三四 高麗象嵌青瓷瓶



圖三三 汝窯瓶 大英博物館藏



圖三二 日本愛知縣猿投窯址出土注壺 10世紀

置注流和壺把的九世紀湖南長沙窯製品（同圖一九），而韓半島高麗青瓷玉壺春瓶之器形特徵也和北宋汝窯同式瓶頗有共通之處（圖二二二）（Kojima Kenji, 2004），從其瓶身「何處難忘酒」等象嵌詩句內容得知（圖二二四）（國立中央博物館，一九九二），高麗青瓷玉壺春瓶亦屬酒瓶。

酒器之外，也有以玉壺春瓶插花的例子。除了前述龍門石窟浮彫和長樂公主墓（六四三）壁畫等北朝至唐代早期實例之外，日本相對保留了較多的以玉壺春瓶插花的圖像資料。其中包括元享四年（一二三四）石板碑刻的供養蓮花（圖二二五）（細川護貞監修，一九七五）。其次，製作於一四〇〇年前後的《祭禮草紙》所見玉壺春瓶則內插仙翁花置於大和繪前所懸掛三對幅的前方（圖二二六）（山根有三，一九九六）。此外，滋賀縣弘法寺藏鎌倉時代天台寺密教灌頂用的所謂「布薩形水瓶」則是在介於本文所分類之卵形（A式）

和洋梨式（D式）即玉壺春瓶瓶身一處設注流（圖二二七）（奈良博物館，一九九二）。以玉壺春瓶為主體基本形其實蘊含著豐富的創作空間，匠人們只需在局部略予變動即可獲得具有特色、適應各不同場域的瓶式。在此，我們可以韓國新安元代至治三年（一二三三）沈船打撈上岸的中國陶瓷為例做一觀察，因為這是一樁遺物製作於同一時段且發現於同一考古遺址的難得案例。除了無加飾的玉壺春瓶之外（圖三八），其既可在瓶頸肩部位飾泥條形耳（圖二九）、獸形腳環（圖四〇），或在獸形腳環上方加置雲耳（圖四一），也可以安裝注流和把手做為注壺使用（圖四二）。後者因多附蓋，故其口沿多作可承載子蓋的盤口式（文化公報部等，一九九二；東京國立博物館等，一九八三；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二〇〇六）。可以附帶一提的是，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典藏有於玉壺春瓶身加裝金屬製把



圖三六 日本《祭禮草紙》所見玉壺春瓶 約1400年



圖三五 日本元享4年（1324）石板碑刻所見玉壺春瓶



圖三七 日本密教灌頂用花瓶 滋賀縣弘法寺藏 鎌倉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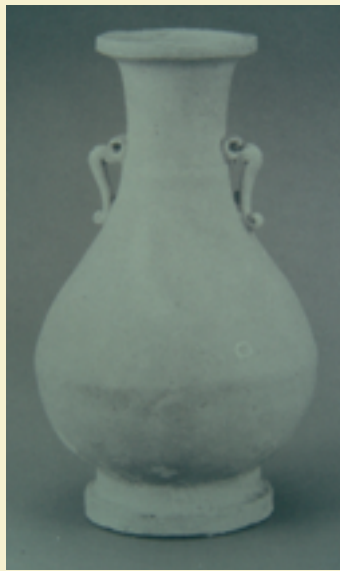
手和流的圖繪（圖四三）（A. Jackson & A. Jaffer eds., 2004），從圖上方徽章可知這件被稱為 Fonthill Vase 之原作現藏於愛爾蘭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Ireland, Dublin）的元代景德鎮青白瓷瓶原是匈牙利路易王（一三四二—一三八二）的收藏，是十四世紀歐洲收藏中國陶瓷並予以改裝的珍貴實例。其次，將玉壺春瓶改裝成注壺一事既反映了當時歐洲的裝飾時尚和器式需求，同時也透露出中國元明時期大量燒造此一瓶式外銷的原始契機。我們可以輕易地設想到：當中東或歐洲的人們接觸到造型酷似其所熟悉的希臘、羅馬瓶式但卻是以上高溫燒

成的中國施釉玉壺春瓶或同式注壺時，其內心的奇妙感受。

由於部分玉壺春瓶所見鋪首啣環裝飾乃是汲取了中國古代銅器的裝飾構思，因此該一瓶式往往又成了儀禮場域的用器。前引文獻所見玉壺春瓶曾被使用於葬儀、慶典等正式場合即為一例。換言之，初見於北朝，宋代以後廣為流行的玉壺春瓶之瓶式雖非中國自身的創意，卻在中國得到高度的發展，以致滲入做為中國文化核心的禮儀殿堂，成為宋代以來具有代表性的古典瓶式之一，甚至逆銷外國。元代王大淵著《島夷志略》提到由中國赴「戎」（今馬來半島克拉地峽（Isthmus of Kra）附近之春蓬（Chumphon）的「貿易之貨，用銅、漆器、青白花碗、磁壺、瓶」（蘇繼頤校釋，一九八一），我認為「磁壺、瓶」應做「磁壺瓶」，後者用今天的話來說，很可能就是「瓷玉壺春瓶」。無論如何，就陶瓷史的領



圖四十 元代龍泉窯獸首啣環貼花瓶 韓國新安沈船 約1323年



圖三九 元代青白瓷雙耳瓶 韓國新安沈船 約1323年



圖三八 元代龍泉窯玉壺春瓶 韓國新安沈船 約1323年



圖四三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玉壺春瓶圖繪 (1342-1382年)



圖四二 元代青白瓷注壺 韓國新安沈船 約1323年



圖四一 元代青白瓷雙耳瓶 韓國新安沈船 約1323年



圖四六 越南青花瓶 15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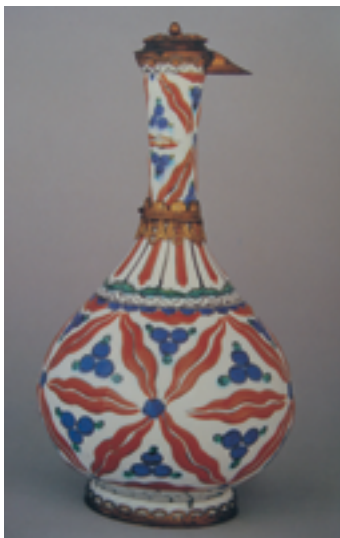
圖四五 粉青鐵繪瓶 朝鮮王朝



圖四四 備前燒 桃山時期



圖四九 土耳其 Iznik 釉下彩繪瓶 16世紀
大英博物館藏



圖四八 土耳其 Iznik 釉下彩繪瓶 16世紀
大英博物館藏



圖四七 泰國 Sri Satchanalai 青瓷瓶 14-15世紀



圖五〇 中東地區細密畫

域而言，宋代以來廣為流傳的具有特色的玉壺春瓶，也是亞洲各國競相製作的時髦瓶式，進而形成各地匠人於此共通瓶式上各盡其妙的熱鬧局面，並且持續數百年而不衰。這些各具風味的作品，表現各有千秋，但本文只想試著列舉一、二，以為結語的註腳。由東北亞、東南亞到中東，分別是十六世紀日本桃山時期備前燒「鶴首德利」（圖四四）（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學藝部學藝課，二〇〇五），韓半島十六

世紀朝鮮王朝粉青鐵繪瓶（圖四五）（MOA美術館等，二〇〇二）、越南青花八稜瓶（圖四六）（三上次男編，一九八四）、泰國北部十四至十五世紀Sri Satchanalai青瓷瓶（圖四七）（Nicol Guénin and Dick van Oenen, 2005），以及土耳其Iznik十六世紀的釉下多彩瓶（圖四八）和注壺（圖四九）（Nurhan Atasoy and Julian Baby, 1989）。另從中東地區細密畫畫面的場景可知（圖五〇）（Thomas W. Lentz & Glenn D. Lowry, 1989），玉壺春瓶於中東地區亦屬酒器，一三六九年於

巴格達製作的伊兒汗朝「庭園饗宴圖」(圖五一)〔杉村棟編，一九九〇〕，不由得又會讓人聯想到前述元墓壁畫的「備酒圖」(圖六、九、十)。

總結以上敘述，我想再次強調的是，不少精煉、結晶於宋代的古典器式之祖型，其實來自進口的舶來品。以往對於輸入中國之工藝品的考察多偏重於隋唐時期進口之金銀器



圖五一 伊兒汗「庭園饗宴圖」 1396年

及其對於中國其他工藝品的影響。不過，就目前的資料看來，輸入中國的玻璃器之器形和裝飾構思也對中國的工藝品影響至鉅，甚至於如梅瓶、紙槌瓶或以上所討論的玉壺春瓶等具有典範意涵、精煉完成於宋代之瓶式的祖型，也多可追溯至外國的玻璃器。此一課題，值得深入探究。■

引用書目：

1. 三上次男編，《世界陶磁全集》一六·南海（東京：小學館，1984）。
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晉東南文物工作組（沈振中等），〈山西長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9期。
3.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馮文海），〈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考古》1961年3期。
4. 山根有三，〈いけばなと座敷飾り〉，收入同氏，《花道史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96）。
5. 文化公報部等，《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서울特別市：文化公報部等，1988）。
6. 日本UNESCO協會連盟，《ターラントの黄金展》（東京：朝日新聞社，1987）。
7.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敬等），〈河北省內丘縣邢黨調查簡報〉，《文物》1987年9期；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處編著，《邢台隋代邢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8. 王克林，〈北齊庫狄迴洛墓〉，《考古學報》1979年3期。
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1. 中國美術全集編集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2.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10期。
13.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韓森寨元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14. 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編，《佛門秘寶大唐遺珍 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國考古文物之美一〇（台北：光復書局，1994）。
15. 杉村棟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一七卷・イスラム（東京：小學館，1999）。
16. 尾崎洵盛，《陶說注解》（東京：雄山閣，1981）。
17. 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處編著，《邢台隋代邢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18. 河北省博物館等（唐雲明等），〈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年11期。
19. 河北省博物館等（鄭紹宗），〈河北曲陽發現北魏墓〉，《考古》1972年5期。
20. 奈良博物館，《特別展 密教工藝 神秘のかたち》（奈良：奈良博物館，1992）。
21. 長沙窯編輯委員會，《長沙窯》作品卷・壹（長沙市：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22. 長沙窯編輯委員會，《長沙窯》作品卷・貳（長沙市：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23. 宜昌地區考古隊（全錦雲等），〈當陽長坂坡一號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3年1期。
24. 東京國立博物館，《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と東西文明の交流展》（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3）。
25.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新安海底引揚げ文物》（東京：中日新聞社，1983）。
26.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注器》（和泉市：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1986）。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趙清等），〈鞏義市北窯灣漢晉唐五代墓葬〉，《考古學報》1996年3期。
28.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1期。
29. 佐藤雅彥等，《東洋陶磁》五 大英博物館（東京：講談社，1980）。
30. 吳興漢，〈介紹安徽合肥發現的元代金銀器皿〉，《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2期。
31. 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桑永夫等），〈洛陽北道元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2期。
32. 施靜菲，〈元代景德鎮青花瓷在國內市場中的角色和性質〉，《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八（2000）。
3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劉恒武），〈陝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畫墓〉，《考古與文物》2000年1期。
34. 孫機，〈唐李壽石柳線刻的《仕女圖》、《樂舞圖》散記（上）〉，《文物》1996年5期。
35. 細川護真監修，《いけげな》別冊太陽（東京：平凡社，1975）。
36. 深井晉司，〈アナーヒター 女神裝飾鍍金銀製把手付水瓶一所謂「胡瓶」の源流問題について〉，收入同氏，《ベルシア 古美術研究》ガラス 金屬器（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
37.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
38. 國立中央博物館，《高麗陶瓷銘文》（서울 特別市：國立中央博物館，1992）。
39. 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新安船窟 등 이 시 이 陶瓷交易》（木浦市：國立海洋展示館，2006）。
40. 陳定榮，《影青瓷說》（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
41. 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2期。
42.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香港：商務印書館等，1993）。
43. 湖北省博物館等（全錦雲），〈湖北鄭縣唐李徽、閻婉墓發掘簡報〉，《文物》1987年8期。
44. 傅冬根，〈江西清江山前南朝墓〉，《文物資料叢刊》八（1983）。
45. 富平縣文化館等，〈唐李鳳墓發掘簡報〉，《考古》1977年5期。
46. 湖南省博物館（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3期。
47. 無錫市博物館（錢宗奎），〈江蘇無錫市元墓中出土的一批文物〉，《文物》1964年12期。
48. 愛知縣陶磁資料館學藝部學藝課，《桃山陶の華麗な世界》（愛知縣：愛知縣陶磁資料館，2005）。
49. 植崎彰一編，《世界陶磁全集》二・日本古代（東京：小學館，1979）。
50. 遼寧市博物館等（莊文彬），〈四川遼寧金魚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4期。
51.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韓兆民），〈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11期。
52. 廖寶秀，〈一是一是二雍乾兩朝對峙的磁胎瑯彩〉，《故宮文物月刊》279期（2006）。
53. 劉靜，〈古瓶盛酒後釀花 花酒由來本一家—宋代梅瓶、玉壺春名稱由來〉，《東南文化》1998年1期。
54. 謝玉珍，《明初官方用器的人物紋》（私立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55. 臨潼縣博物館（趙康民），〈臨潼唐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記〉，《文博》1985年5期。
56. 蘇繼頤校釋，《島夷志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1）。
57. 陝西歷史博物館等，《昭陵文物精華》（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1）。
58. 龍門文物保管所等《龍門石窟》第1卷（東京：平凡社，1987）。
59. 揚之水《宋代花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7年1期。
60. A. Jackson and A. Jaffer eds., *Encounters: the Meeting of Asia and Europe 1500-1800*, V&A Publications, London, 2004.
61.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62. Chuimei Ho, "Social Life Under the Mongols as Seen in Ceramics,"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6.
63. Donald B. Harden (岡本文一譯)，〈ローマン・グラス〉，《世界ガラス 美術全集》—古代・中世（東京：株式會社求龍堂，1992）。
64. M. Alram & D. Klimburg-Salter, "Jens Kröger Laden with Glass Goods from Syria via Iraq and Iran to the Famen Temple in China,"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1999.
65. MOA美術館等，《心のやきもの 李朝—朝鮮時代の陶磁—》（大阪：讀賣新聞大阪本社，2002）。
66. Nicol Guérin and Dick van Oenen, *Thai Ceramic Art-The Three Religions*, Suntree Media, 2005.
67. Nurhan Atasoy and Julian Baby, *IZNIK, the Pottery of Ottoman Turkey*, Alexandria Press, London, 1989.
68. Regina Krahl, "Famous Brands and Counterfeits: Problems of Terminology and Classification in Song Ceramics," *Song Ceramics: Art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Technology*,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2004.
69. Thomas W. Lentz & Glenn D. Lowry,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89.